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乔力 主编

唐宋文选

宋绪连 丛甫之
杨树增 张红星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司 北京京联图
行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唐宋文选

宋绪连 丛甫之
杨树增 张红星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数据

唐宋文选 / 宋绪连等选注.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 乔力主编)

I . 唐... II . 宋... III . ①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唐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宋代
IV . I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1411 号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唐宋文选

宋绪连 丛甫之 杨树增 张红星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 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22.5 印张 495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 - 80680 - 177 - 4 / I · 096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007)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顾问 王运熙 邓绍基 吴宏一 陈华昌 杨雨前
张炯 傅璇琮
主编 乔力
副主编 邵东 胡大雷 黄道京 葛承雍

编纂委员会

丁少伦	马自力	马 奕	门 崧	方智范
王定璋	王英志	甘 英	刘文忠	刘庆云
刘怀荣	刘扬忠	刘明浩	刘峰焘	许 总
乔 力	池 倩	朱晓晨	杜贵晨	李 方
李少群	吴兆路	吴章贵	张玉璞	张亚新
张光芒	陈庆元	陈如江	陈洪宜	杨 明
杨 政	欧明俊	武卫华	施议对	周满江
周锡山	赵永纪	赵敏俐	胡大雷	荣 斌
洪本健	高 巍	聂雷之	崔海正	桑林佳
徐其超	曹顺庆	章亚昕	黄道京	黄 霖
寇养厚	韩 璞	郭 丹	葛承雍	程郁缀
管士光				

总序

乔力

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会天然地形成一种非常优势,使得中国文学有可能在足够漫长的时间里创造出辉煌业绩,给人类文明留下极为丰厚的精神遗存,供我们民族永远怀想受用。不过,像许多事物都拥载着多元复杂属性一样,如果从对面角度来看的话,则又同时变作某种很沉重的承传负担。因为一旦面对这些山聚海积般浩繁汗漫的书册卷章,便立即涌生出接受的困难困惑:你到底应该读些什么?究竟怎样读?而实际上又能够读得了多少?——局限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制约,社会或个人都难以做到无论巨细差等,皆通体包纳,所以,就必然性地出现了如何选择乃至精选的问题,并进而牵涉到一系列的判断观念和运作标准。

新世纪伊始,直面自然人文等各学科门类的分工日趋专精细密、生活工作节奏紧张快捷、实用功利目强化而竞争异常激烈严峻的局面,现代中国早已疏离了古代农业社会那种伴青灯明月、细细把玩体味以穷年皓首的闲散心境与惟求任心适意、不需再计虑效果收益的淡泊无为态度。那么,已然产生凝定而属于历史的文学作品,怎样才能够跟随不断发展前进的时代步伐,仍成为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融入未来,并由民族走向世界,张扬它永恒的美?换言之,永远是人们感性的愉悦飞扬和理性上育导教化的绝不能被替代的必需。

缘于上述,我们方始编纂这套大型书库,指出了贯通古今、以时代纲领文体的结构框架和精选的、具载恒久垂范意义的“经典”式作品总汇——即通过纵向的历时性观览,从整体上展现自远古

洪荒的先民制作开端直至最较晚近的 1949 年以前的所有中国文学产生、发展、丰富、极盛而蜕变新生的流变轨迹与大略面貌。使人们在直觉审美感受的过程间，获取系统全面的中国文学知识，熟谙洞悉它的每个结构成分。另一方面，也借助横向共时性的断面取舍，使得相应的具体作品充分传现那些关于文学本体以及某一特定文体样式的美学特性和艺术精神；并因其创作巅峰的最绚丽景观所辉耀的最大可能性范型价值，或由一定的阶段空间所显示出的一定更代嬗变类型。要言之，它们既包容有当时的复杂社会现实的典型意蕴，同时又未曾丧失、消解掉充沛张扬的现代生命活力，乃是屡经时间长河的荡涤淘洗，以代积层累方式架构起巍峨的中国文学经典大厦。它千门万户、千姿百态，永远流闪着辉煌璀璨之光。

下面再就《中国文学经典书库》的诸有关事宜略为阐明：

——首先是读者定向。我们关注的是具备中等文化程度，乃至大学生、研究生、工作着的白领蓝领们与所有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最广泛的读书界朋友。衷心希望《中国文学经典书库》能成为你们的“精神家园”，为你们不断追求探索的焦灼心灵伸展开一片清新温馨的绿荫，吹进青春热情的气息。

——其次是编纂的框架构想和意图。这里自然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体部分。具体而言，每种精选本前皆首先设置“导论”，概述本文体于此书所界定之历史时段内的演进行程和重要业绩，并在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上，论析其表现特征、思想内涵及主流艺术精神；进一步阐述因整个文学现状与此特定文学样式自身运动规律所生成出现的创作流派、风格面貌。而以后的篇幅，则以选录的作家作品为单元。“作家简介”除却例行的生平行迹说明外，特别注重其文学活动及与文体相关的创作情形，目的在于强化“评论”色彩，由之使这种个案的微观烛照同“导论”的具体文体现象的中肯评析，以及《中国文学经典书库》收入的《中国文学

史》中的“总论”《中国文学流变概说》所作的宏观把握，形成为点、线、面纵横交织、互相呼应的框架结构模式。至于选录作品，首先认定的是审美价值——一种纯文学本体的意义，然后就艺术创造性来统领其他社会教化等内涵，求得两者的有机融合。其后的“品鉴”，则无论总瞰俯览、远察旁涉为印证而生发妙境，还是探幽抉微、精擘细辨以臻达澄彻洞明之胜地，抑或径从个别主旨、意趣、背景来进行阐释考订，均系视各自实情的需要落笔，并不强求规范一致。相反，我们倒是力求多角度、广视点的繁色纷采，精当出新。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除却主体的作品部分，还另有五种既断代又互为联续衔接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各自具载相对独立性，但整合总观之，则成为从先秦直及现代的通史。考虑到前面主体部分既有的“导论”、“品鉴”及此书中的《中国文学流变概说》，已经构成的交错呼应的网式框架所涉及过的内容，为了避免重复，同时也便于改变、拓展视野，故这部文学通史则侧重于对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上整体文学面貌的宏观把握，注重描述其行进过程中产生的艺术流派及创作风格、文学思潮、重大现象等，尽可能地弱化一般作家作品的具体剖析。当然，在总则方面遵循这种撰写精神的基础上，各断代文学史也有各自的特点，方式方法并不求整齐划一。

——另外，作为一部集体协力撰写完成的大型丛书，我们一直强调贯穿通体的连续谐调指向，故而与另一类的个体研究著作同样承载着严肃的责任感。应邀参加的多为学术造诣深厚精湛的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山东、广西、辽宁、山西、江苏、福建、湖南、四川、贵州等各地声誉卓著的高等学府和专业研究机构，其中有些熟识并在我主编的另一些丛书、书系里多次合作过，有的却是首次共事。但无论怎样，我们都抱有事业与友情并进的相同宗旨，愿意在有限的生命途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留下一段美好愉快的记忆，以慰藉那本原性的苍凉。

上个世纪初，值当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五四”的一批知识精英以大智慧、大学识、大勇气，奋然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僵化、因循守旧陋习，引进西方近现代文明，倡扬“民主”“科学”精神，吹进来健康新鲜空气，以永远的青春和激情开启一代新风，让人们看到希望和未来——每想到这些，我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如今又值新世纪伊始，考量已往，眺望前途，将会作出什么样的思考呢？我想，是该出现文学文化大师、学术巨人的时候了。但现今触目所见，太多了些掂斤称两的匠人雕琢的小家子气。就一定意义而言，大师巨人的产生需要最广泛的、适宜的文化基础与时代土壤，但适宜的基础、土壤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培植。那么，就让我们脚踏实地，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文化学术素质起始，作一些消除浮躁之气、纯净人们心灵、积累培植基础的工作吧！记得上世纪 40 年代初，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名人传·贝多芬传》的“译者序”说：“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该有更深刻的意。”我想，这是“五四”精神的延续和一种新的演绎。由是言之，除却工艺技能与客观科学知识的训练、学习外，文化文学素养的充益提高，对于“心灵”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同着新世纪的朝阳前行，是应该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这既是幸运，也更是历史的使命——《中国文学经典书库》便是最新一份工作成果，愿新世纪的人们喜欢它。

无庸烦言，限于学识和精力，诸多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教正，这是对我们的关心与鼓励，铭感之情将永远在我们心中。

2004 年春于北京旅舍

导 论

唐宋散文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高峰。这个时期形成了古代散文史上最重要的文学运动——唐宋古文运动，对散文的体裁与形式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开拓，革新了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涌现出以“古文八大家”为中坚的一大批散文作家，选就了新体古文创作空前繁盛的局面，一改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骈文为主的局面，变为以散文为主，从而为后来古代散文的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元、明、清散文基本上是唐宋散文传统的延续。

—

隋及初唐承袭南朝余习，骈文仍居统治地位，文坛上弥漫着轻靡浮艳的文风。杰出政治家魏徵以其内容充实、刚正淳朴的奏疏，力矫浮华之风，提倡文质并重的新文风，反映了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初唐四杰”斥责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表达了文学改革的心声，其作品虽未能尽脱骈文窠臼，却给骈文带来了一股刚健之风。陈子昂高举文学革新的旗帜，要求恢复“汉魏风骨”与“风雅兴寄”的传统，其碑志表序疏朴近古，已开盛唐融散入骈之先河。论者谓“子昂诗文，在唐初实首起八代之衰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韩公以前，文章复古之功，不能不推原伯玉已”（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一），当为确评。元结、柳冕也都有较明确的古文主张。元结的政论文有《丐论》、《化虎论》等，敢于批评现实，对韩柳的讽刺性杂文有一定的影响。

他的《右溪记》、《茅阁记》等山水游记已注入抒情、议论成分，开柳宗元之先声。

唐朝中叶，韩愈、柳宗元相继登上文坛，继承前辈复古的传统，提出系统的古文理论，不仅适应了中唐复兴儒学的政治思想斗争的需要，而且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在“复古”的旗帜下进行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

古文运动的理论核心是文以明道。韩愈说：“愈之志于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柳宗元也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文者以明道”，“羽翼夫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较好地解决了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文道关系，作家修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等问题。韩柳反对骈体，提倡散体；反对陈陈相因，提倡词必己出；反对专事雕琢，提倡文从字顺，等等，纠正了前辈古文家们的理论偏颇，使古文运动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向前发展，把中国古典散文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由于韩柳等古文家既批判华而不实的骈体时文，又能吸取骈文之长处、其他文体的优势，所以，他们的古文是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和时代新特点的新体古文，是我国古典散文发展创新的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新成果。

韩愈的新体古文创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杰出成就。他的《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从“道统”出发，立论精深，笔力雄健。杂文《获麟解》、《杂说》等，借题发挥，托物言志，亦庄亦谐，妙趣横生。《祭十二郎文》颇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它突破以四字韵文为祭文的常格，以长短错落的散文表达与十二郎家人父子亲厚至深的感情。诚如林纾所说：“至病彻心，不能为辞，则变调为散体。”（《韩柳文研究法》）可谓“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未尝有意为文而文无不工，祭文中千年绝调。”（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八）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石鼎联句诗序》、《圬者王承福传》等，往往熔叙事、描写、议论于一炉，人物形象栩栩

如生。《送董邵南序》、《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是赠序文的名篇，善于摆脱传统赠别之作的框架，因人而异，从一点生发开去，写出一段精妙文字，或记叙友情，或抨击社会，或抒写襟怀，富于变化，新意叠出。

柳宗元的新体古文创作成就，足与韩愈相媲美。其论说文，如《封建论》、《贞符》、《时令论》、《天对》、《非国语》、《六逆论》等，严正斥责帝王受命于天的荒诞谬见；指出殷周时期分封制的形成并非取决于“圣人”之意，而是客观之“势”所造成的；否认有开天辟地的造物主，把自然变化视为阴阳二气“交错而动”，“自斗自竭，自崩自缺”的结果，闪烁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光辉。文学论文，如《与韦中立论师道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等，论述文以明道，强调为文要有所本，有所参，“旁推交通”，博采众长，为古文运动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他的杂文，如《观八骏图说》、《黑说》、《鞭贾》、《起废答》等，因事言理，托物寓愤，借古讽今，开晚唐讽刺小品的先河。《蝦蟇传》、《三戒》等寓言，形象生动，寓意深刻，是千古不朽的杰作。传记散文，如《段太尉逸事状》、《童区寄传》、《宋清传》等，多为封建时代下层普通人立传，或讴歌其英雄品格，或颂扬其劳动技能，或借以寄寓自己的政治见解，继承并发展了司马迁的传记文学传统。柳宗元的游记散文，以“永州八记”为代表，不仅逼真地展现出永州山水的自然景观，而且借景写心，巧妙地传达出怀才不遇、贬谪蛮荒的幽愤情绪。肯定自然美，亦即肯定自己；自然美被冷落，亦即自己为世所弃。从这个意义上说，“夫古之善记山川，莫如柳子厚。”（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五）并非溢美，虽然，柳宗元之前，已有谢灵运的《游山志》、元结的《右溪记》等游记散文，但，就境界之幽邃、情景之交融、影响之深巨而言，“永州八记”确实超越前人、后启来者，在古代散文发展史上树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

在韩、柳倡导古文运动的推动下，在韩、柳新体古文创作的影

响下，涌现一批优秀的散文家，如刘禹锡、吕温、吴武陵，或才辩出众，或文笔雄健，几近柳宗元；而皇甫湜、李汉、张籍等，或尚平易，或求奇崛，颇有韩愈文风。刘禹锡的《陋室铭》、吕温的《古东周城铭》、吴武陵的《遗吴元济书》、白居易的《庐山草堂记》、元稹的《乐府古题序》等，都是优秀的散文作品，这些无疑壮大了新体古文的声威。

晚唐文坛出现分裂，一方面是骈文声势渐涨，一方面是杂文创作放出夺目的光辉。诚如鲁迅所指出：“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例如，陆龟蒙的《野庙碑》，直斥贪官污吏，笔裹冰霜，尤为犀利。罗隐的《英雄之言》奇思横出，文情跌宕，揭露统治阶级攻杀劫夺的本质相当深刻。皮日休的《鹿门隐书》共六十三则杂文，借古讽今，富有批判性。确实表明他是“汲汲以救时补教为志”（《请孟子为学科书》）的。

杜牧、孙樵是晚唐能继承韩柳古文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中的佼佼者。杜牧说：“称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称夫子之尊莫如韩吏部。”（《书处州韩吏部孔子庙碑阴》）他自觉地继承韩柳古文传统，主张“以意为主”，强调为文要有充实的内容和积极的社会作用，有益于拓展散文的反映时空。《杭州新选南亭子》是一篇辟佛的精采文字，把佛教的虚妄、佛说“慈悲”的本质揭示得痛快淋漓。《阿房宫赋》是著名的赋体散文。前半描写，以简笔勾勒，极写阿房宫之壮丽、宫女之众多、珍宝之繁夥；后半议论，辞锋犀利，“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一段，直斥晚唐封建统治者，具有强烈的讽喻意义。这篇“诗人之赋”打破传统的赋格，以抑塞不平之气，驰骋俪之辞，纵横排宕，俊语叠出，时散时骈，或韵或不韵，颇有创造性。孙樵以韩愈的直系传人

自居，主张“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别华，期到圣人”（《与贾希逸书》）。其《乞巧对》等文章，颇具韩愈文风。他的《书褒城驿壁》，貌似记叙，实为政论，先述褒城驿由盛及衰的过程和原由，后借老氓之口，发出“举今州县皆驿”的感慨，点醒抨击腐败、指斥时弊的主旨。《书何易于》是传论文，刻画了一个廉洁刚正、勤政敬业、体恤民艰的县官形象。后并设为问答，表明清官虽政绩卓著却不被重用，而残民以逞的官吏却平步青云。于此，朝廷之腐败、官场之黑暗暴露无遗。

二

宋初文坛，杨亿、刘筠等宫廷文人“循五代之旧，多骈俪之词”（《宋史·文苑传序》）致使浮艳的西昆体风靡四十多年。最早起来反对浮靡时文，倡导古文的是柳开和王禹偁。柳开批评“辞涩言苦”的时文，而自己为文亦不免“辞涩言苦”，因而很难挽回积重难返的颓风。王禹偁提出“革弊复古”、“传道而明心”、“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主张，并写出《待漏院记》、《黄冈竹楼记》等散文，对宋文形成“平易畅达”的风格起到先锋作用。此外，还有石介、姚铉、穆修等人，都对绮靡骈文介绍予严厉批判，对恢复古文传统做了舆论上的准备。直到欧阳修步入文坛并进而主持文坛，以其政治影响和古文创作成就，培养、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学者文人，才彻底改变了西昆体统治几十年的文学风气，形成了继唐代之后的又一次古文运动。

欧阳修在《答祖择之书》中说：“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致。”强调为文重道、经世致用，与韩柳的古文思想一脉相承。但，欧阳修又认为文道不能等同，道不能代替文：“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

书》),“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送徐无党南归序》)。他还继承并发展韩愈的“不平则鸣”论,提出“穷而后工”说。在作品的艺术标准上,欧阳修赞同韩愈的务去陈言的观点,但反对一味“求深”、“务奇”的倾向。可以说,欧阳修的古文理论更注重社会实录,也更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为宋代的新古文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石,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欧阳修的散文创作是其古文理论的实践,“文简而意深”,“意切而语缓”(《论尹师鲁墓志》)创建一种平易畅达、委曲自然的散文风格。《朋党论》、《与高司谏书》、《五代史·伶官传论》、《答吴充秀才书》等议论文,无不阐发其对历史和现实的真知灼见,立论精警,论正严密,虽“急言竭论”,却意切语缓,委婉曲折,平易流畅,富于感情和气势。《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秋声赋》等篇,以骈散结合的句法,描绘亭堂景物和人物活动,利用声韵、对仗的技巧传情达意,显示一种整齐美、韵律美。《尹师鲁墓志铭》、《祭石曼卿文》、《祭尹师鲁文》等记叙文,不虚善、不溢美,行文简古,感情浓厚,是“文简意深”、“事信”“言文”的典型文字。《梅圣俞诗集序》、《送徐无党南归序》等赠序、书序文,或发表精辟见解,或倾吐知遇之情,或对人物进行传神描写,感情含蓄,笔法多样。概言之,欧阳修不仅以其古文理论,而且以散文创作的实绩,指引了宋代新古文运动的前进方向。同时,他以“庆历革新”为依托,采取行政手段,提倡平易畅达的古文,奖掖、扶植三苏、王安石、曾巩等致力于古文创作的优秀人才,使宋代新古文运动实现了唐代古文运动未竟的事业,完成了文体、文风、文学语言革新的任务。因此,欧阳修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苏轼的散文创作,是沿着欧阳修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其议论文《留侯论》、《贾谊论》、《韩非论》等,常针对时弊,从古事翻出新意,发出惊俗卓见,透露出超人的机智和才华。可以看出,他深

受孟子、贾谊、陆贽的散文影响，滔滔雄辩，又明快晓畅。其杂文小品，诸如论文谈艺的《日喻说》、《文说》、《书吴道子画后》、《筼筜谷偃竹记》等，叙事写景的《记承天寺夜游》、《记游定惠院》等，信笔写来，姿态横生。亭台记《超然台记》、《凌虚台记》、《喜雨亭记》、《放鹤亭记》等，随物赋形，波澜起伏，颇具庄子文风。传记文《方子山传》、《韩文公庙碑》、《司马温公神道碑》等，往往突破正史传记、碑志的常规，善于选取二、三事以见人物形貌情志特征，并借议论以抒情寄慨。其新体文赋前后《赤壁赋》在“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际所作。以散文、游记、杂文笔法，巧妙地将古与今、主观与客观、现实与理想融为一体，抒写身处逆境之中的苦闷悲愁和旷达乐观的矛盾心态。前后两赋，前赋设为问答，后赋写景叙事，而寄托之意悠然言外者，两赋皆同。两赋笔法虽异，而“着想之奇同，惜词之工同，见地之高同，结构之妙同。语语之皆仙，笔笔之入化，亦无不同。”（《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八》）两赋堪称杜牧《阿房宫赋》之后新体文赋的杰作。概言之，苏轼散文的艺术风格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人称“韩潮苏海”，又有“欧苏”并称之为誉，苏轼确实是唐代古文运动卓越继承者，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文坛领袖和古文运动的领导人。宋代古文运动实际上是由苏轼最后完成的。把散文写作提高到文学创作的高层次，使散文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这是苏轼在散文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

除欧、苏之外，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辙等古文家也创作了相当出色的散文作品。曾巩继承了古代散文“重道”的传统，弘扬儒家民本思想关切民生疾苦，研讨治国之道，为文“皆因事而发”，褒贬时政，有很强的现实性。名文有《寄欧阳舍人书》、《战国策目录序》、《越州赵公救灾记》、《墨池记》等，或记事，纤徐委备，深切往复，结构严谨，长于议论。以古雅平正见长，稍多了一点道学气。王安石是欧阳修倡导的宋代古文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加者。他

坚决反对西昆派头面人物“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的文坛颓风，主张“文章合世用”，“务为有补于世”，形式“要之以适用为本”（《上人书》）。其散文简劲明快，雄健峭拔。议论文最为出色，《答司马谏议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等辞锋锐利，体大思精，说理透彻，识见超群。其《游褒禅山记》不以记为主，却借题生发议论，体现了王安石散文长于论说的风貌。苏洵的散文纵厉雄奇，政论、史论名篇有《权书·六国》、《权书·项籍》等，立论深刻，笔法苍劲，论证周密，剖析透辟。曾巩所谓“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苏明允哀词》）可称确评。记叙文虽然不多，但也有可圈可点的名篇，《木假山记》、《张益州画像记》即是。赠序《送石昌言使北引》是一篇文道统一、情文并茂的爱国主义作品。苏辙发展了韩愈的“气盛言宜”的论点，认为“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上枢密韩太尉书》）。其文章“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似其为人”（刘大漠《栾城集序》）。《上枢密韩太尉书》、《黄州快哉亭记》、《庐山栖贤堂记》等是其散文代表作。苏辙的散文成就虽不及父兄，但亦能独树一帜，无愧于古文八大家之列。

在欧、苏前后或周围，还有一些知名的古文家是不该忽略的。例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缘情设景，借题生议，抒写万物一体、心系天下的宽广襟怀，展示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的人格理想，“开拓后人之胸臆者为不少也”（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卷七）。写景用骈句，议论用散体，骈散错综，富有变化，其语言风格近似王禹偁，而情致韵味则远过之。周敦颐的《爱莲说》，以花喻世，以莲誉人，盛赞“幽同夫菊而不傲，艳类牡丹而不俗”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以展现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不媚世、不附势的“君子”风貌。这篇优美的散文，不仅继承了诗骚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而且透露出来代文学饶有“理趣”的文化信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部卷

帙浩繁的编年体通史，而《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李愬雪夜入祭州》等称得上史而有文的散文名篇，在似乎平淡的从容记叙中，将一个个历史亡灵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晁补之的《新城游北山记》，记叙游览北山一天一夜的见闻，着意描摹幽静谧的北山自然美，其“摹写极工，巉刻处直逼柳州”（《唐宋文举要》评语），寄托了作者涤荡名利、超迈俗务的情趣。它的客观景物与主体情思融为一体，是宋代山水记中佳构。正是由于有“宋六家”的散文创作实绩和一大批优秀的散文作品，才共同铸成了宋代散文的繁荣局面。

在两宋之际和南宋时期，因面对金、元入侵的民族危机，报国雪耻、恢复中原成为古文家的共同主题，散文作品大多洋溢着爱国主义思想。例如，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李纲的《议国是》，岳飞的《五岳祠盟记》，胡铨的《上高宗封事》，陈东的《上高宗第一书》，陆游的《跋李庄简公家书》，辛弃疾的《美芹十论》，陈亮的《上皇帝四书》，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等，无一不是感情激越的正气歌，才华横溢的散文精品。

两宋的笔记杂文，数量十分可观，内容极其丰富，大至典章制度、历史纪实、遗闻轶事、地理沿革、文学源流，小到世情民风、人物琐事、见闻杂录、技艺器用、读书心得，几乎无所不记，无所不有。北宋自欧阳修《归田录》发端，继之有沈括的《梦溪笔谈》，苏轼的《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南宋有洪迈的《容斋随笔》，罗大经的《鹤林玉露》，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入蜀记》，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周密的《癸辛杂识》，岳珂的《桯史》，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等，在史学、文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文献价值，有些文学优美生动，是很好的杂文小品。陆游的《入蜀记》是一部日记体的游记，文字简练，负有盛名。其中描述三峡风光一节，随意点染，不假雕饰，读来饶有兴味，颇有身临其境之感。